

# 绿色政治的民粹化与民粹主义的绿色化

——对欧洲环境民粹主义的考察\*

傅 聪

**内容提要:**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环境问题的挑战,绿色政治站在了民粹主义与环境主义的交汇点。环境问题进入民粹主义的议程,成为欧洲绿色政治的一种新形态和新方式。本文将环境民粹主义界定为民粹主义思想中的绿色观念及相关的行为方式,并对其极左、左、中、右、极右五种意识形态类型进行分类讨论。通过分析环境民粹主义利用政党竞争和政党体系的潜在结构性机会的策略,可以发现政治光谱左右翼两端出现了绿色政治的民粹主义趋势以及民粹主义的绿色化。环境民粹主义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既带来了强化民族主义的势头、导致绿色政治陷入分裂与矛盾、抵消相关治理机制等挑战;也带来了对环境民主进行政治和认识纠偏、重新衡量人民的生态归属价值、提供超越“身份”的绿色凝聚力等机遇。民粹化的环境主义蕴含了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现代化的开放式探索。

**关键词:**环境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绿色政治 欧洲

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极大地动员了民众对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保护意识、行动和诉求。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背景下,第三波环保主义出现。其特征是环境专家(通常是律师和科学家)在规则设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直接与企业 and 政府机构进行谈判,利用市场机制在污染控制、能源政策和其他环境问题上实现增长、效率与环保的平衡。重大的全球环境议题(如气候变化)的主流叙事话语体系由专家和技术官僚掌控,经常忽视社会动

\* 感谢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员所看重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sup>①</sup>以科学为指引,通过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审慎工作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气候政治的主流。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强调达成共识并坚持科学和技术驱动的工具和目标。在环境决策中,草根环保人士的意见常常被忽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式全球化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遭受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中下阶层更是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泥沼。同时,全球环境治理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为起点),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理成效,全球范围内绿色正义缺失,环境危机仍在不断上演。

主流的左翼或右翼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并未很好地化解民众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主流环保团体在面对政府时,采取妥协的态度,而组织官僚化和领导人专业化也导致这些团体忽视了草根支持者的新关切,使许多草根环保人士愈加失望。在欧洲,一些环境主义者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方式扩大绿色社会运动的声势。“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灭绝反抗”(Extinction Rebellion)等社会运动组织要求采取更激进的气候和环境保护行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一边秉持气候变化怀疑论,一边以环境和资源等议题吸引更多的选民。绿色的民粹主义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传统左右意识形态之外,审视和寻找欧洲绿色政治驱动力的新视角。

民粹主义在欧洲的绿色政治辩论和政策实践中引发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学界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还需进一步加强。本文旨在全面分析民粹主义与绿色政治间的相互联系,提出一个包含绿色领域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环境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政党竞争和结构性机会)和左右翼政治的立体分析框架,以捕捉环境民粹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及其带来的政治变革。本文首先对环境民粹主义的话语及行为进行界定,对其复杂的意识形态进行类型学分析;其次,通过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两端考察环境民粹主义的政治行为,阐释环境民粹主义的自利性特征;最后,思考环境民粹主义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绿色议程,并给欧洲政治带来深刻影响。

## 一 理解环境民粹主义

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系列蕴含生态哲学和反建制立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新

---

<sup>①</sup> Rachel Wetts, “Models and Morals: Elite-Oriented and Value-Neutral Discourse Dominates American Organizations’ Framings of Climate Change,” *Social Forces*, Vol.98, Issue 3, 2020, pp.1339-1369.

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危机使绿色政治与民粹主义产生交集,建构了可被称为环境民粹主义的思想空间。

### (一) 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学和政治学基础

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哲学基础来自绿色政治。绿色政治包含了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应该如何组织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社会正义、非暴力和基层民主的一系列政策、倡议、政党行动或社会运动。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绿色政治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思考和方式,旨在促进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社会。

生态智慧、社会正义、基层民主与非暴力是绿色政治的核心理论或价值观。<sup>①</sup> 这里的生态智慧涉及生态学或生态哲学(“ecosophy” or “ecophilosophy”)的诸多方面。挪威学者阿恩·内斯(Arne Næss)在1973年提出了生态哲学以及深层生态学的概念,意指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生态平衡要考虑污染、资源、人口、价值等诸多要素,因而,生态哲学衍生出基于不同哲学假设的深层生态学以及相对应的浅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因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道德审视,而被认为比一般主流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浅层生态学给出了更加深刻的哲学结论。

生态哲学强调对非人类世界给予道德考虑,主张将其纳入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如何回答人类对自然世界影响的意义、如何反思现代工业化社会模式并加以改造是划分深层生态主义和浅层生态主义的一个底层逻辑。深层生态主义,也被称为“深绿”,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现代工业化社会模式的彻底改变为前提,它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生态主义。浅层生态主义或“浅绿”则寻求管理当代生产和消费模式带来的外部性。浅层生态主义还被冠以“环境主义”的名称,以便与“生态主义”划出分野。<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 Derek Wall,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reen Politics*,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2010。

<sup>②</sup> 学界存在“生态(民粹)主义”和“环境(民粹)主义”的不同术语。对于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绿色思想体系家族,因为它们们在激进性和类型学上表达出的差异而是否被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存在一些争论。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从哲学意义的角度认为,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经济、社会观的不同。他在《绿色政治思想》中指出,生态主义不同于环境主义。生态主义聚焦于地球本身,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持深层生态学的价值原则,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主义因表达出人类生存条件的某些根本性真理并提出政治规划和行动纲领,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环境主义更像是一种应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性方法,而非意识形态。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环境主义被定义为关于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一种广泛的政治、社会运动。它主张保护、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及其关键要素(生物),采用至少有利于良性对待环境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涵盖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阵营,也囊括了生物中心主义的思想流派。尽管存在使用上的一致,但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关注的生态学内核是一致的,而环境主义的外延包容性更强。因此,本文在分析民粹主义与绿色政治互动的过程中,使用“环境民粹主义”的表述方式,以便于在论述中以“环境民粹主义”兼容对深浅程度不同的生态主义思想的讨论。参见[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郗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18-44页;《大英百科全书》网站环境主义词条,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environmentalism>。

以生态哲学为核心理论支柱的绿色政治倾向于支持社会进步主义。既有研究表明,<sup>①</sup>左翼绿色政治思想的基本外延包含了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和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红绿”两大阵营;欧洲的绿党和左翼政党构成了实践左翼绿色政治思想的核心力量;“深绿”生态自治主义的探索意义大于它的现实变革成效。与左翼绿色政治哲学相对,绿色政治中的右翼包括了生态资本主义和绿色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学界基本认为,许多右翼政党属于“浅绿”阵营,其理论假设建立在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态和环境的进步之上。<sup>②</sup>技术依赖的人类中心视角决定了生态资本主义只能做出“浅绿”意义上的革新,目的不在于解构资本主义,因而显著区别于“深绿”与“红绿”。此外,生态问题从19世纪现代环保主义出现开始,就依其政治背景采取了或解放或反动的形式,活跃于右翼边缘地带的生态法西斯主义即是深层生态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的合体。<sup>③</sup>

环境民粹主义是环境议程与反建制的意识形态的结合,是对传统政治框架及其与生态问题关系的一种批判性的再评价。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爆发危机后,民粹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绿色政治站在了民粹主义与环境主义的交汇点。环境问题进入民粹主义的议程,成为绿色政治思想和社会动员的一种新形态和新方式。历史地看,环境民粹主义是对19世纪末美国农民民粹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初草根环境运动遗产的一种继承。有学者指出,“生态民粹主义是人民保卫家园的政治,是反对精英家长式统治、拥抱多元化和平等的民粹主义政治。”<sup>④</sup>对传统政治框架处理生态问题的审视发现,新自由主义环境和政策体系中的绿色民主运动面临着碎片化和“只关注自身”的困境;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民粹式的左翼政党和领导人。<sup>⑤</sup>右翼民粹主义叙事

---

① 有学者关注到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深绿”生态主义理论,参见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自治主义述评》,第80-88页;郇庆治:《生态自治主义理论及其绿色变革》,第5-20页;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生态主义思想,参见李厚羿:《论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载《马克思主义学刊》,2020年第3期,第130-138页;关注地区政党的“红绿联姻”,参见王聪聪:《试析北欧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向’》,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5-129页。

② 参见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90-98页;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第175-179页;王聪聪:《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探析》,载《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第35-41页。

③ 参见 Janet Biehl and Peter Staudenmaier, *Ecofascism: Lessons from the German Experience*, AK Press, 1995; Peter Staudenmaier, *Ecology Conteste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Between Left and Right*, New Compass Press, 2021。

④ 参见 Gregory Koutnik, “Ecological Populism: Politics in Defense of Hom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1, 2021, pp.46-66。

⑤ [西班牙]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何娟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第35-45页。

与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导致环境民粹主义的出现。<sup>①</sup> 环境民粹主义在欧洲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民粹主义给绿色民主带来了挑战。<sup>②</sup>

## (二) 环境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

民粹主义在政治学界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主要原因在于民粹主义呈现出的样貌非常的丰富和多元。认为社会被分割为二元对立的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在思想、行动、文化上的对立,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弱核心性,即它是一种薄弱的意识形态,可以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生态主义。<sup>③</sup> 从政治运作逻辑来看,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不受制度性的规则和程序制约,即反建制。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紧迫,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出现在绿色政治之中。生态环境问题与民粹主义的连接点在于:一方面,“自然”是“人民”的权利、遗产和身份的一部分。保护自然景观、森林、海洋、气候和动植物与“人民”产生共鸣。而且,在环境民粹主义的话语中,环境问题成为对“普通人”的威胁,强化了“人民”与“精英”的对立。燃油税和脱碳激励等环境政策代表着精英主义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攻击。环境民粹主义者强调,我们不只是要保护人民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还将保护人民免受精英阶层的伤害,这些精英阶层根本不在乎气候政策将给人民带来的代价。环境政治是典型的后物质主义问题,大多数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质,拉大了普通公民与环境政治之间的社会距离。<sup>④</sup> 作为“他者”的精英通常是参加国际组织的环保行动者,他们被认为好高骛远、观点脱离实际、反应迟钝,其主张的政策违背了“普通人”的利益和常识。同时,科学家是科学的传播者,作为精英的一部分,也被视为可疑的、被政治化的行为者。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危机的紧急性和严重性是将环境运动与民粹主义战略结合在一起的逻辑基础。气候动员行动将气候“紧急状态”与特殊性质的政治策略相结合,旨在按照战时进行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动员来模拟气候政策。

不少国家的环境政治运动与民粹主义产生交集,形成了可被称为“环境民粹主

<sup>①</sup> 参见 Ander Audikana and Vincent Kaufmann, “Towards Green Populism? Right-wing Populism and Metropolitanization in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46, Issue 1, 2022, pp.136-156.

<sup>②</sup> 参见王红艳:《环境民粹主义在欧盛行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第56-61页。

<sup>③</sup> Michael Oswald,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pu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sup>④</sup> Tobias Böhmelt, “Populism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1, No.3, 2021, p. 103.

义”的思想空间。“气候正义行动”(Climate Justice Action)诞生于联合国气候治理缔约方年度会议的边缘空间,同时也在开拓自己的平行空间。例如,“气候正义行动”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发起大规模的动员行动。它主张促进和加强土著和受影响人民在应对气候危机时的权利和声音,认为在欧洲内部,种族、性别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是欧洲层面争取气候正义斗争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sup>①</sup>又如,2010年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举行的第一次“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世界人民会议”上,参会者表达了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的不满。会议发布了《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主张世界人民举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公投,建立气候司法法庭,<sup>②</sup>试图解决气候政治框架的群众基础问题。在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环境民粹主义在传统环境主义基础上增加了反建制的话语。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呼吁,左翼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攻势需要以“绿色民主转型”的名义发起,将保护环境与反对不同形式不平等的多种民主斗争联系起来。

除了上述位于政治光谱左翼的环境民粹主义行动之外,右翼民粹主义者发展出反建制的、民粹主义的环境话语,将非环境政治诉求与环境诉求相结合。例如,借助脱欧昙花一现的英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独立党(UKIP)抨击英国能源政策的失败时,将三个主流政党描述为“他者”,称绿色议程没有使他们成为地球的朋友,却成为人民的敌人。德国选择党(AfD)强化“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将环境问题描述为对“普通人”的威胁。人民需要承担从煤炭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所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但不能从中受益。这引发人民对环境议程增加国民经济负担的担忧。

由此可见,环境民粹主义的概念涉及政治领域内面对环境挑战的反建制的人民、多种的意识形态视角和多样的社会动员方法三个层面。基于环境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表现,鉴于环境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的话语扩大社会运动的声势和争取党派的支持率、民粹主义政党拥抱绿色议题吸引更多选民等现象的出现,本文将环境民粹主义界定为,民粹主义思想中的绿色观念及相关的行为方式,主要涉及民粹主义者对绿色话语的使用和绿色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这两个维度的结合。

---

<sup>①</sup> Climate Justice Action, “What Does Climate Justice Mean in Europe?” A Discussion Paper,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223195805/http://www.climate-justice-action.org/resources/documents/what-does-climate-justice-mean-in-europe/>.

<sup>②</sup>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People’s Agreement,” 22 April 2010, Cochabamba, Bolivia, <https://pwccc.wordpress.com/support/>.

## 二 环境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

民粹主义存在两个方向上的反建制运动,即寻求激进变革的进步反建制运动和寻求某种传统价值理念的保守反建制运动,它们往往被区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sup>①</sup> 民粹主义是一种弱意识形态,与不同的强意识形态相关联,形成极左、左、中、右、极右五种意识形态类型。环境民粹主义也是如此。环境民粹主义关于生态观、环境政策或科学作用的特定话语,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了泛左翼环境民粹主义、泛右翼环境民粹主义与市场自由环境民粹主义的分野(见表1)。

“人民”的边界是模糊的,身处政治光谱不同位置的民粹主义者都能找到自己或左或右的定位,覆盖不同位置的力量。<sup>②</sup> 泛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推崇社会平等、财富再分配和大政府的方案,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归咎于大企业和寡头,主张文化多元主义。泛右翼民粹主义者拒绝社会平等和大政府方案,反对社会融合,将民族的文化和利益放在首位。居中的市场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一般特征是信奉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原则和政府在经济最小的干预。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区别在于对精英的批评不涉及移民或少数群体的第三方,右翼民粹主义通常是仇外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

环境民粹主义与左翼思想结合时,其主要诉求包括:反对贪婪的、扩张成性的资本主义对环境和生态的剥夺与破坏;重视公平,担忧精英控制下气候政策的分配效应;怀疑潜在的“漂绿”行为;主张环境治理中突出更广泛的参与性民主。而右翼环境民粹主义受反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价值观驱动,将气候变化视为世界主义精英把控的话语,因而对其产生敌意。它主张更多的地方性、本土主义,尤其是当专业技术精英及其气候议程被认为威胁到国家主权之时,保护主义就会滋生。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者则通常是一些自由的或保守的环境团体,他们将环境问题归咎于过度的新自由主义,并主张基于市场的改革,反对大政府,青睐商业式的国家运行模式。

<sup>①</sup> 林德山:《欧美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影响及应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9月上期,总第177期,第70页。

<sup>②</sup> 同上文,第69-70页。

表1 环境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分析

左右分野 意识形态	极左	左翼	中间/市场自由主义	右翼	极右
本体论	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 反资本主义 担忧气候政策的分配效应 参与性民主 怀疑潜在的“漂绿” 反对绿色财政紧缩	个人主义 自由市场 精英领导 商业式的国家运行 反对大政府	民族主义 不满精英统治 本土主义、保护主义 文化同质性 传统主义	民族主义
认识论		科学信徒 整体政治生态学	商业第一	气候变化怀疑论 科学是由国际精英推动的	
生态观	深生态学	深生态学 支持国际机构	浅生态学	浅生态学	生态法西斯主义(eco-fascism); 生态种族主义(eco-racism)
全球合作				反国家利益的政府间承诺 资源民族主义	

注:表由作者自制。

尽管民粹主义普遍由于对精英和专家缺乏信任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科学研究政治化,但左翼环境民粹主义认同科学和科学机构主张的科学知识和预测,持一种整体的政治生态学观点,以整体性的方法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互动,及其在人类—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复杂性。右翼民粹主义者以普通人的常识对抗专业知识的权威,依赖个人经验,认为个人经验构成的知识比科学共识更有价值。因而,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许多右翼环境民粹主义者是气候变化怀疑论的支持者,他们拒绝气候科学,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全球科学机构提出的人类行为与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相关性的科学结论,宣传二氧化碳对环境和农业的积极影响。气候变化怀疑论背后的经济、社会逻辑在于,在全球化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大环境下,后工业社会中特定群体感觉自己被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抛在后面”,经济和政治地位被边缘化,主流政党的政策议程不再能代表他们。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他们将气候变化怀疑论作为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趋势的逆反,不认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可以拯救地球,而是视其为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精英的表演。

在国际合作问题上,与世界主义(即人类构成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契合最广泛的左翼的主张构成了全球环境议程的核心;广义的民族主义位于其对立面,将国家利益置于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关切之上。一般而言,左翼环境民粹主义者普遍支持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但会担忧国际环保合作中的不平等,主张更加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公平的资金、责任分配。右翼环境民粹主义者认为国际合作将导致违反国家利益的政府间承诺,他们关注其所属的本地和区域,反对全球化。德国选择党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指责生活在“平行社会”中的“全球主义阶级”,在世界各地自由移动,不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不受“他们本国下雨”的影响。<sup>①</sup>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前身为“国民阵线”)的环境政策中也有类似的对地方主义的关注,且拒绝无约束的全球化。其领导人玛丽亚·勒庞(Marine Le Pen)强调,重要的是对环境问题做出“现实和爱国”的回应。她抨击跨国公司的转基因作物和杀虫剂“毒害”土地,呼吁更加有机的农业和开展“就地饮食革命”。<sup>②</sup>

从社会动员角度来看,环境民粹主义者通过积极甚至激进的手段推动各国政府正

<sup>①</sup> Amanda Machin and Oliver Wagener, “The Nature of Green Populism?” *Green European Journal*, 22 February 2019,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the-nature-of-green-populism/>.

<sup>②</sup> Jocelyn Timperley, “French Election 2017: Where the Candidates Stand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Carbon Brief*, 7 March 2017, <https://www.carbonbrief.org/french-election-2017-where-candidates-stand-energy-climate-change/>.

视全球气候危机,主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星期五为未来”的领导者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将精英(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不作为归为导致气候危机恶化的原因。由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南方国家比北方国家更大,因而精英的不作为是全球不平等的根源。<sup>①</sup> 尽管将通贝里归为民粹主义者并非没有争议,但她的民粹主义叙事代表着年轻一代和未来一代的环境意识。人民可以通过挑战精英的意愿和挑战忽视气候变化现实的公司和政府,采取行动取得积极成果。<sup>②</sup> 环境民粹主义运动中还有采取更为激进的不服从手段的草根团体,如“灭绝反抗”以被拘捕作为公民抗议的手段,迫使政府采取气候行动。2019年,英国议会宣布地球进入“环境与气候变化紧急状态”,可被视为环境民粹主义运动成功的案例之一。

环境民粹主义经常表现为两个阵营的对立。左翼属于进步的“绿色浪潮”,左翼环境民粹主义者持生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般推行亲环境政策。例如,“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主张保护人民的绿色过渡,将环境危机归咎于“寡头统治”。然而,右翼环境民粹主义的环境立场差异较大。它们可以是支持保护环境(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环境民族主义或资源民族主义者、气候民族主义者,甚至是生态法西斯主义者,但也有可能是气候变化否认和怀疑论者或反环境主义者。绿色政治思想和民族主义共存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家园即是德国环境民族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自然和国土保护方面的环境需求除了出于纯粹的生态考虑之外,它们总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需求相关联。民族主义常常与排他性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相连,还具有明显的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特征。因而,一些右翼民粹政党(如法国国民联盟)的环境民粹主义议程经常是支持保护乡村、自然和“家园”的地方或国家环境政策。气候民族主义议程侧重于采取国家层面的有限措施,拒绝超国家(欧盟或全球)的政策。例如,保守派英国地方发展、社区及住房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批准了英国近30年来的第一个煤矿开采许可。批评者指出,认为新煤矿可以减少英国对进口煤炭的依赖,甚至英国可能因煤炭出口、转移排放而受益的逻辑忽略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这是气候民族主义行动的一个生动事例。<sup>③</sup> 更有甚者,例如,玛丽亚·勒庞在关于移民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言论涉嫌生态法西斯主义,她指出,大规模移民是对环境和法国文化的威胁,法国应关闭其边界

<sup>①</sup> 参见 Greta Thunberg, “We’ll Be Watching You,”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Speech at Climate Action Summit, 2019。

<sup>②</sup> 参见 Greta Thunberg, “How Dare You?” Madrid, Speech at COP25, 2019。

<sup>③</sup> Peter Somervill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Nationalism,” *The Ecologist*, 20 December 2022, <https://theecologist.org/2022/dec/20/problem-climate-nationalism>.

避免移民的侵害。<sup>①</sup>可见,环境民粹主义的右翼共享反建制的内核,但它们的环境主义哲学观却“深”“浅”不一。

总之,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激进或极端的环境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它的激进或极端是与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即在反建制方面具有一致性,其核心的呈现是人民追求基层民主的、解构当权派的绿色政治。环境主义是环境民粹主义者共享的生态哲学观念。在环境民粹主义的左侧空间,极左和左翼环境民粹主义都以深生态观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同时在后真相时代结合了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基层动员的特征和优势。在环境民粹主义的右侧空间,极右和右翼环境民粹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更为多元,在民族主义方向上的极端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之所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类型的主要逻辑在于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反建制特征。可以发现,左翼皆为环境主义者,右翼则不乏以自利为旨向的环境机会主义者。此外,左翼环境民粹主义与同为深层生态主义的原教旨生态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激进性的内核有所不同。原教旨生态主义的激进性主要立足于其反工业社会秩序的诉求。

### 三 自我中心主义:弱核心的绿色民粹政治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方便利用的、自我中心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这源于环境民粹主义的弱核心特征。环境民粹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是深绿派还是浅绿派,依政治竞争环境而定。对于拥抱环境民粹主义的政党来说,其将意识形态的底色赋予了选举中的机会。因此,站在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看,它成为一种可被左右翼政治方便取用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环境民粹主义的政治理论具有空心的特征,它依附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竞争中不同话语和议题的需要,它是一种采取权宜之计的政治策略。政治领导人利用环境民粹主义可以方便地将绿色政治民粹化,或以民粹主义绿色化来实现大规模的动员,寻求或行使政府权利。在多数情况下,它发挥着一种吸引眼球、博取选民共鸣和支持的工具性思想体系的作用,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作为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政治策略,环境民粹主义成为一种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激进思想体系,并为左右分野的政治所使用。

---

<sup>①</sup> Alistair Walsh, "Eco-fascism: The Greenwashing of the Far Right," DW, 19 May 2022, <https://www.dw.com/en/what-is-eco-fascism-the-greenwashing-of-the-far-right-terrorism-climate-change-buffalo-shooter/a-61867605>.

### (一)绿色民粹政治的自利性

绿色民粹政治的自利性集中体现于,环境民粹主义常常是为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目的重新建构政治议程,其遵循的是扩大选民基础规模的政治逻辑。

首先,从环境民粹主义的形成逻辑来看,自利性的环境民粹主义为政党竞争提供了一个选项。由于社会变化不断地对可持续发展提出要求,因此,环境议题的(政治)“显著性”(Issue's Salience)日益凸显。环境议题同时是一个“共识问题”(Valence Issue),在跨党派的选民和决策者中存在共识,可以被用来评估政党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由于主流环境政策存在种种局限性,需要新的制度设计去代表要求环境主义变革的那部分选民。环境民粹主义的激进性可以吸引这部分选民,他们通常会支持左翼政党的议程。另一方面,当全球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国家未能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时,普通民众特别是“被落下的”群体容易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环境主张所吸引。这部分选民通常被右翼政党所代表,他们基于民族、种族等身份支持适度的环境主义。总之,激烈的政党竞争推动了环境议程的异化。环境民粹主义为政党提供了区别于传统政党和绿党的意识形态选择。

其次,环境民粹主义利用了各个政党体系潜在的结构性机会。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解释,环境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潜在政治机会结构的产物。欧洲社会对生态问题非常关切,对政治体系存在不满。因此,当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明确界定,或者没有得到主流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充分关注或全心全意支持时,对环境民粹主义而言,一个政治机会窗口就会打开。民粹主义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环境议题作为他们的核心议程,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在主流政治中,如果既没有强大的绿党,也没有全心全意支持生态立场的制度环境,那么环境民粹主义有利于吸引选民。同时,抑或在主流政治制度接受、采取环境政策或存在强大的绿党时,利用普通选民对政治体系的不满,拥抱其对环境政策效果的负面情绪,此时,利用环境民粹主义对政党来说可能是有益的。

### (二)绿色政治的民粹化

就泛左翼政治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掠夺性不平等,主流环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盟,使得许多左翼感到无法应对主流环境政策局限性造成的挑战,需要对现行的民主结构和分界重新进行制度设计,以代表新出现的环境主义变革者的利益。左翼思想家墨菲认为,第三条道路思维夷平了政治生活的激进核心。在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左翼激进派认为环境问题可以成为改变左翼颓势的催化剂。左翼应将民粹主义世

界观作为表达生态社会主义的手段,提出推进社会生态主义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战略。绿色政治的民粹化正是厌倦了传统的环境运动方式,在生态中心主义框架上建立起强大而持续的左翼民粹主义的一部分。

环境主义与政治行动之间的互动逻辑是绿色政治民粹化的基础。这种互动可以从政治动员和政党竞争中窥见一二。推动英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先锋、提升绿色政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环保组织在英国发起了系列的激进行动所产生的政治动员结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运动包括:2019年“灭绝反抗”在伦敦发起持续的、导致伦敦部分地区陷入瘫痪的激进抗议运动;“星期五为未来”的组织者通贝里在英国议会发表激烈的批评性演讲。2019年5月,英国议会宣布地球进入环境与气候紧急状态,同年6月,修订后的《英国气候变化法》正式生效。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宣布此类紧急状态和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此后,世界各地不断有国家、城市和地方宣布环境、气候紧急状态,制定了环境、气候应急政策。环境、气候紧急状态将解决气候问题的迫切性类比为国家进入战争的急迫境地,促使气候和环境政策从政府决策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政治决策的核心内容。

环境议题显著性日益上升以及与泛左翼政党家族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法国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离开社会党,先后创建了激进左翼政党联盟——左翼阵线(Left Front)和民粹主义左翼政治运动——不屈的法兰西。左翼阵线和不屈的法兰西都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立场,对解决环境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主张采取比法国欧洲生态-绿党(Europe Écologie-Les Verts)和社会党更为激进的生态主义和环境政策,以实现社会体系的变革。左翼阵线在2013年发布《生态社会主义18条论纲》,谴责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危机的根源、批评主流政党的失败。梅朗雄指出,生态紧急状态是生态系统达到极限的结果,金融资本主义耗尽了人类和生态系统。建立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意味着要打破当前的制度。不屈的法兰西的政策和措施是以人民的名义伸张正义,消灭寡头,废除地球“种姓”特权;重新规划市场和竞争,建立一条“绿色规则”,既不过度开采资源,也不生产超出自然承受能力的物品。梅朗雄参加了三次法国总统大选。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获胜,梅朗雄获得11.1%的选票,欧洲生态-绿党候选人乔利获得2.31%的选票。绿党加入奥朗德政府后,受缺乏环保雄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拖累,力量逐渐衰弱。不屈的法兰西看到了填补欧洲生态-绿党和社会党空间的机会。同时,为了与经济危机背景下右翼政党的民粹主义竞争,不屈的法兰西通过转向环境民粹主义来争取关注气候

问题、受过教育且年轻的选民,①支持“黄马甲”运动,批评绿党提倡的自上而下的绿色转型将会排除和惩罚弱势群体。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梅朗雄获得21.95%的选票,排名第三,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欧洲生态-绿党的候选人仅获得4.63%的选票。

总之,环境民粹主义推动了绿色社会运动和政治的民粹化,成为泛左翼政党在面对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困局时的一个思想和行动的武器。

### (三)民粹主义的绿色化

环境民粹主义还出现在右翼政治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打破了左翼政党对绿色议题所有权的垄断。自然保护杂志《Die Kehre》(The Turning)在社论中将生态问题描述为20世纪70年代被左翼绿色运动“抢劫”的右翼的“皇冠珠宝”,并主张重新定义这个主题,将其从“Klimaschutz”(气候保护)拓宽至“Heimatschutz”(家园保护)。②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绿色化表现为拥抱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负面情绪(负绿色化),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立场。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家族中有7个政党(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瑞典民主党、丹麦人民党、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英国独立党)对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发的科学共识持怀疑态度。③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气候保护主义行动称为“气候歇斯底里”,认为不应不考虑民众的经济状况而一味地追求气候目标。例如,德国选择党指责风电场对德国的“本土鸟类”和“童话森林”构成危险。其政治家高兰表示:“选择党不会参与其他政党的气候歇斯底里”。④尽管环境民粹主义右翼经常反对气候变化政策,但是,为了满足年轻选民的需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立场在慢慢改变。⑤

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环境议题与民族主义结合,发展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环境民粹主义。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当时的国民阵线(现更名为“国民联盟”)几乎没有与环境相关的政治主张。但在最近的十年内,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国民联盟开始了绿色化。其政治家埃尔韦·朱

① 参见 Chloé Alexandre et al., “From The Front de gauche to La France insoumise: Causes and Consequence of the Conversion of the French Radical Left to Populism,”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Vol.14, No.2, 2021, pp.935-950.

② Philip Oltermann, “German Far Right Infiltrates Green Groups with Call to Protect the Land,” *The Guardian*, 28 June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28/german-far-right-infiltrates-green-groups-with-call-to-protect-the-land>.

③ Stella Schaller and Alexander Carius, “Convenient Truths: Mapping Climate Agenda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Berlin,” Adelphi 2019, pp.10-12.

④ “Climate Hysteria’ Is German ‘Non-word of the Year’,” DW, 14 January 2020, <https://www.dw.com/en/climate-hysteria-is-picked-as-german-non-word-of-the-year-2019/a-51994215>.

⑤ Michael Oswald,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pulism*, p.326.

万(Hervé Juvin)主张绿色爱国主义的极右思想,其核心是基于身份的“民族绿色地方主义”(Nationalistic Green Localism),包括限制贸易协议、支持当地工业和限制移民等政策。2014年,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发起了一场生态民族主义运动(Nouvelle écologie),目的是反对国际气候谈判。她在几次演讲中提议,要使欧洲成为“世界领先的生态文明”,需对气候变化做出“爱国”和“现实”的反应。她推崇植根于右翼传统土壤的、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和基于身份的环境主义愿景。由此可见,国民联盟的绿色化虽然与气候怀疑论决裂,但它是传统民族民粹主义目标的自然延伸。环境民粹主义作为基于身份的环境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将民族主义和环境主题整合到一个观念框架之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振兴当地工业和保护国家身份等不同问题,在这个意识形态混合物中共存并相互作用。

生态法西斯主义也成为泛右翼政治利用环境议题的一种方式。生态法西斯被定义为一种集权的政府形式,为了生态整体(所谓“土地”)的利益和国家的荣光而要求牺牲个人福祉。<sup>①</sup>极右翼政党利用绿色问题将法西斯极右思想移植到社会意识形态中。环境和气候问题为生态法西斯主义所用,以实现“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目标。它在支持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为白人至上和反移民“摇旗呐喊”。例如,极右翼政党声称乱扔垃圾或污染完全是由移民造成的;移民是“不关心环境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家园。

#### 四 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的挑战和机遇

环境民粹主义从根本来说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状况的回应。在以人文主义和技术为主导的文化中,人类对生物圈的干预使所有生物都面临危险,即人民与精英出于环境敏感性形成了对危机的认知并采取行动。全面、立体地考察民粹主义才能分析其在绿色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显然,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挑战,也带来了变革。

第一,环境民粹主义加强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不利于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的推进。右翼环境民粹主义反对国际主义精英,拒绝超国家层面的决策,形成了一种气候民族主义的力量。意大利联盟党(Lega)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但并不接受《巴黎协定》及全球气候治理机构,不愿通过欧洲议会中大多数的气候政策。其党

<sup>①</sup> Michael E. Zimmerman, “Ecofascism,” in Bron R. Taylor, 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Nature*, Vol.1, Conituum, 2008, p.458, 531.

主席詹卢卡·皮尼(Gianluca Pini)称《巴黎协定》是在向下妥协,它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遵守环境法规的意大利公司进行不公平的竞争。<sup>①</sup>意大利联盟党将气候变化描述为只能在国家或地区层面解决的问题,因此,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重要。法国国民联盟和西班牙呼声党(Vox)已经开始倡导它们自己的民族环保主义,拒绝国际协议,但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政策。就呼声党而言,它一方面倡导保护西班牙的“自然遗产”,另一方面反对外部对国家碳排放的控制。<sup>②</sup>对于欧盟来说,尽管如意大利联盟党在内的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受气候保护政策,但其主张的气候民族主义排斥技术官僚支撑下的全球和区域气候政策体系,使得气候保护政策变得高度政治化,进而可能导致全球和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陷入因政党意识形态两极分化而造成的僵局之中。

事实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联合国框架下气候条约的谈判和实施步履维艰、进展迟滞,正是西方国家气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的一种映射。<sup>③</sup>在欧洲内部,欧洲议会内存在浓厚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张通过降低转型速度和强度来提高民众对“欧洲绿色协议”的耐受程度,实现欧盟绿色新政软着陆。欧洲政坛这种向右转的整体格局挑战着欧盟成为第一个零碳大陆的议程,不利于其实现以绿色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此外,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似乎与青睐民族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不能共处,这表现为右翼环境民粹主义利用自然主义的逻辑主张反移民,与解决仍在增加的“气候难民”流动议题构成冲突。环境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种族身份认同。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正是以奉行文化保护主义和反对移民来突出其对国家主权的捍卫。民族主义的环境民粹主义与国际气候条约和欧盟气候治理的分歧仍在持续。

第二,使用方便、自利导向的环境民粹主义导致绿色政治陷入更多的分裂和矛盾之中。应对环境危机、进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提出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这正是绿色政治分裂和矛盾漩涡的中心。在欧洲,环境民粹主义加剧了气候政策与能源政策的对立。

---

<sup>①</sup> Alexander Ruser and Amanda Machin, “Nationalizing the Climate: Is the European Far Right Turning Green?” *Green European Journal*, 27 September 2019, <https://www.greeneuropeanjournal.eu/nationalising-the-climate-is-the-european-far-right-turning-green/>.

<sup>②</sup> Lluís de Nadal, “Green Populism: How the Far-right Embraces Ecology,” *Voxeurop*, 24 February 2022, <https://voxeurop.eu/en/green-populism-how-the-far-right-embraces-ecology/>.

<sup>③</sup> Alexander Ruser and Amanda Machin, “Nationalizing the Climate: Is the European Far Right Turning Green?”

为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成为第一个零碳大陆,欧盟推行能源转型,引发了能源政策与气候政策的矛盾。加速推进能源转型让广大民众承受了出行等生活成本增加的痛苦,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抗议政府为了推动能源转型而提高燃油税的政策。在声势浩大、严重影响社会正常运转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提高燃油税的计划,这对法国气候政策的推进和政府公信力都造成负面的影响。环境民粹主义在法国折射出的是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和对政府不满等深层次的问题。

围绕煤矿的转型,波兰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之中。波兰环保组织抗议煤矿运营造成了环境污染,要求政府加快淘汰煤炭,推动能源转型。但是,关闭煤矿的政策也遭到了多方反对。波兰煤矿工人和工会担心失业和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和社区不想失去经济支柱;煤矿企业反对政府的环境限制性举措。在波兰多次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PiS)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采取了疑欧的气候变化怀疑主义政策。该党以对波兰的经济和能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为由,多次阻止欧盟限制碳排放和减少煤炭使用的立法;为煤矿业提供财政支持、推迟关闭计划。环境民粹主义帮助法律与公正党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利益。通过推行保守的能源政策,法律与公正党强化了国家主权意识,稳固了选民基础,保持了在波兰政坛的地位。但是,波兰的可持续治理成绩使其亟须认真探索平衡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道路。<sup>①</sup>

第三,环境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抵消了部分环境机制的成果。一项定量研究的结果指出,中左翼政党的影响使政府气候政策的得分高出平均水平约22%,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则导致比平均水平下降24%。<sup>②</sup>经验性证据也表明,民粹主义领导与较低的环境绩效密切相关。<sup>③</sup>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经常采取表演式的环境主义行动,接受“洗绿”方案。这样的行动方式忽略或淡化了环境问题的政治和道德维度,如各种行为者和团体的不同利益、价值观和责任。此类政党还经常避免就环境行动的目标、手段和后果进行民主辩论。

第四,环境民粹主义破坏了欧盟通过环境、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的一体化而逐步

---

<sup>①</sup> 根据可持续治理指数报告,波兰的环境政策表现在国际排名中位于底部(第37名)。据欧洲议会智库文章,波兰经济的碳强度在欧盟国家中排名第二。

<sup>②</sup> Ben Lockwood and Matthew Lockwood, “How Do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fluence Climate 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2, No.3, 2022, pp.12-37.

<sup>③</sup> Tobias Böhmelt, “Populism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1, No.3, 2021, p.99; Ben Lockwood and Matthew Lockwood, “How Do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fluence Climate and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pp.12-37.

形成的欧洲“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Conscience)<sup>①</sup>。环境民粹主义削弱或拒绝了欧盟超国家的、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连贯的、雄心勃勃的方法。例如,在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意大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碳排放的管控,支持传统能源发展,并取消了一些环保法规。意大利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其在气候政策方面的立场和行动造成了从整体上减缓欧盟气候进程的推进、影响欧盟全球气候领导地位的不良影响。

第五,不能忽视的是环境民粹主义为绿色政治带来了新变化。尽管民粹主义往往与威权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但其在历史上常常与基层民主相关联。民粹主义的观点可能促进民主的扩大和深化,有助于阐明政治决策中的民主缺陷,提出一些被主流忽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取决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环境民粹主义是人民认为社会秩序“不公平”并组织起来的新事物,不论是对于左翼还是右翼,其有可能成为回应气候变化的新机会。<sup>②</sup>

当前环境民主受到的批评主要是,主流政党在处理保护环境的共识问题上采取家长式和精英主义形式的环保主义。在人民的眼中,在绿色议题上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合流甚至趋同,并且都已蜕变成腐败、无能、迎合的政党。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虽然熟谙选举政治,轮番上台执政,然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普通选民的核心诉求,特别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社会底层的选民承受了通货膨胀、收入增长缓慢、政府削减福利等种种恶果,使得他们的被剥夺感在不断地加深。

格雷戈里·考克尼特(Gregory Koutnik)指出,生态民粹主义提供了对精英和建制派主导的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和认识纠偏的功能。利用人民的力量获取遏制精英和建制派的权力,使用这些权力去执行、改革或废除一些法律和规范,是一种政治纠偏。让

---

<sup>①</sup> 这是托马斯·霍伯(Thomas Hoerber)在2013年提出的观点。欧洲环境意识是通过能源政策一体化的持续行动形成的。欧洲的环境意识反映在欧洲机构中,这些机构与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并行发展。特别是欧盟委员会将能源和环境政策引入欧盟政策规范,从而建立了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反映欧盟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回应欧洲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参见 Thomas Hoerber, *The Origins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Europe: The Beginnings of a European Environmental Conscience*, Routledge, 2013。

<sup>②</sup> Jens Marquardt and Markus Lederer, "Politicizing Climate Change In Times of Populism: An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 No.5, 2022, pp.735-754.

精英看到人民珍视的“生态归属”<sup>①</sup>价值观和对精英政治“理性分配”的不满,是一种认识纠偏。<sup>②</sup>因此,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使精英政治体系“看见”人民诉求的民主手段。

欧洲环境民粹主义挑战了自由精英主导的叙事,提出了所有人都能获得且不限于少数特权阶层的环境保护愿景。左翼绿色民粹运动,如“星期五为未来”“灭绝反抗”“气候正义行动”等,将年轻人、土著带入气候运动、引入气候紧急情况话语,代表着对自由民主的一种纠正,通过破坏常规的决策,促进游离于政治话语之外者的参与。环境民粹主义通过倡导参与式方法来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赋予人们制定环境政策的权力,使非国家行为者加入国际环境协议的谈判,从而让环境民粹主义更具包容性。环境民粹主义的出现反映了民众对建制派常规举措越来越不信任,渴望出现解决环境紧急状态的政策,渴望实现生态正义。此谓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的纠偏。同时,环境民粹主义使建制派精英看到各个身份之下的人民及其珍视的、个体的“生态归属”价值。

环境民粹主义还巧妙地回应了另一种广泛存在的批评,即环境主义是以牺牲经济和就业为代价的。正如考克尼特指出,这种批评忽视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即尽管公众广泛支持环境保护,但政府和企业未能充分管理和保护环境。<sup>③</sup>此外,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建制派没有通过再分配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福利补偿给(如采矿工人、沿海地区、土著社区等)牺牲“生态归属”价值的普罗大众。就此而言,环境民粹主义则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解决为追求发展而忽视牺牲成本问题的框架。环境民粹主义认为,我们星球的繁荣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与非人类共享的生态,它关心并告诉人们如何看待和评估生态价值牺牲与发展政策之间的成本收益平衡,以防止和抵制牺牲已经拥有的生态归属价值。

环境民粹主义是非左非右、超越“身份”的政治思考。处于“后物质主义”社会的欧洲,中产阶级群体庞大,福利国家建设完备。尽管仍然存在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但当代欧洲社会矛盾的动因显然更加的复杂和多层面。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精英和普

---

① “生态归属”是格雷戈里·考特尼克在论文“Ecological Populism: Politics in Defense of Home”中提出的一个术语。他将人们在自己所处环境中感受到的共享的日常生活经历,称为“生态归属”,并提出生态归属可以激发一种自我防卫的政治,即人们会采取政治行动来广泛地保护自己的家园,抵御威胁将其摧毁的经济规范和制度。参见 Gregory Koutnik, “Ecological Populism: Politics in Defense of Home,” *New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1, 2021, pp.46-66。

② Ibid., p. 8.

③ Gregory Koutnik, “Ecological Populism: Politics in Defense of Home,” p. 15.

通人民成为对立的双方。民粹主义政治是一种身份政治,它让基于种族、民族、性别认同的政治碎片化为一个个亚文化圈。但是环境民粹主义动员了无论是左是右的、广泛的人民,提供了一种绿色的价值和文化认同。它可以将碎片化的绿色改革力量重新凝聚起来,挽回被政治极端化和激进化冲击并削弱的治理体系。人民的绿色认同可以构建起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

欧洲环境民粹主义具有的民族主义基因是动员民众反对国家处于生态环境危险状态的一股力量。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风险、气候风险是跨国的,其影响弥散于全球,但这些风险的后果,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仍需由地球上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来承受并加以应对。绿色民族主义是民族浪漫主义的领土和景观概念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合,如果能够成为一种支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民族主义形式,那么绿色民族主义可在民族主义和环境主义之间搭建起桥梁。由此,环境民粹主义也找到了一条支持右翼走上生态现代化的道路。

## 五 结论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政治策略和政治运动从未离开人类政治舞台。在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神话破灭、经济全球化造成经济不平等和身份认同危机的叠加之下,民粹主义席卷欧洲。环境民粹主义为欧洲绿色政治带来了新的变化和考量,它强调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也挑战了主流政党的环境政策。从环境问题入手的研究更加关注政策及实施,而意识形态研究有助于我们超越技术官僚框架,开展更深入的政治讨论。

首先,正如一些学者所争论的,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sup>①</sup>或者是一种可以被任何政治家族跨越政治光谱来使用的话语类型。<sup>②</sup>环境民粹主义也面对着这样的诘问。如上文所述,环境民粹主义是环境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它以环境主义生态观为核心,且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特性,既可以与广泛的特定意识形态(左或右)相结合,也可以方便地被用来动员以适应环境和推动领导者的目标。因此,环境民粹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以环境主义为核心生态观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

<sup>①</sup> 参见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Issue 4, 2004, pp.541-563。

<sup>②</sup> 参见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Verso, 2005。

其次,绿色政治民粹化是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代表的技术官僚构架的一种替代和激进的解决方案。环境民粹主义成为革新左翼意识形态、重构左翼政治的场所。当今处于一个后现代历史阶段,左翼意识形态陷入危机之中。<sup>①</sup> 后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联结取代了代表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选民中的作用。环境民粹主义成为一个能够超越左与右<sup>②</sup>传统意识形态分区,或者说是非左非右的、激进的绿色政治空间。在这里,绿党、生态社会主义者、传统左翼以及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联合开拓环境主义的治理场域,利用其参与地方、区域或国家治理的优势,持续地推行环境主义政策。它具有的民族主义基因是动员民众阻止国家处于生态环境危险状态的一股力量。可以发现,祛除对民粹主义的有色滤镜,有助于更加立体的观察其调动绿色政治中确定性要素的作用。

再次,也不能忽视环境民粹主义对欧洲政治的挑战。环境民粹主义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左右两极分化,且加强了左右分野不平衡的、左弱右强的态势。欧洲环境民粹主义的左翼因工人阶级没落、工会组织疲弱和阶级政治衰微而声势较小,影响范围有限。相比之下,持保守立场的环境民粹主义右翼则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尤其是与民族主义的合流造就了环境民粹主义右翼的强势地位。但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有条件的环境主义支持者,其绿色议程并不连贯,对于打破当前的环境治理方式后如何建立新的平衡并非胸有成竹。

最后,环境民粹主义同时暴露了欧洲环境民主发展中的问题和潜能,可能成为回应环境民主缺陷的新机会。在新自由主义危机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绿色政治需要回应更为复杂的问题,对于环境民主理念进行理论反思。民粹化的环境主义包括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和对生态现代化意蕴的开放式探索。环境民粹主义提供了从政治和认识上对精英和建制派主导的绿色政治体系进行纠偏的潜在能力。因而,环境民粹主义并非一无是处,而是需要绿色政治从民主创造的角度加以利用。

(作者简介:傅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责任编辑:蔡雅洁)

<sup>①</sup> [西班牙]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第35-36页。

<sup>②</sup> “超越左与右”出自[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李德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说明保守主义在自身的演绎中已经走向了反面,而向来以激进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却走向了只注重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他按照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将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勾画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即走向保守主义反面的思想历程。同时,吉登斯也研究了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革命理论发展为它的保守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历程。其结论是,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左派和右派的陈词滥调。